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分析—
本土主義的政治經濟根源¹

文/許寶強

2003年「七一」至今，香港的社會運動此起彼落，大學內外的文化研究也逐步普及。然而，也是在這同一個十年，本地的貧富懸殊繼續惡化、政治民主毫無寸進、新聞言論自由倒退、貪腐浮現廉政崩壞、工作生活質素轉劣。如何理解這個對本地社會運動和文化研究可能是最好的年代，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品質和自由平等民主等「核心價值」卻在不斷倒退的年代？

本文以社會運動和文化研究都曾參與建構的「本土主義」為例，把其興起置放在過去十年以至更長時段的政治經濟脈絡中，嘗試梳理回應上述的問題，希望有助我們理解並走出香港社會目前的困局。

本土主義的階級根源

這裏使用的「本土主義」，意指一種強調本土利益、保育本土文化、保衛本土價值的政治取態和行動。例子包括：天星皇后、反高鐵、保衛菜園村和新界東北的本土社會運動和研究工作；「城邦自治」、「蝗蟲論」等針對的主要源自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和文化力量對香港的負面干擾等論述，以至「光復上水」、「反自由行」等抗中排外的集體行動。儘管這些論述和行動的政治光譜伸延甚廣，甚至相互批評攻擊，但仍然共享對「本土」的關注和重視，並以「本土」作為論述和行動的中心，以至或多或少都對中共和九七年後的香港政權不滿及作出抗爭²。

然而，這種以文化/地緣族群作為焦點的身份政治，其政治經濟根源，卻在很大程度來自「本土主義」視野往往忽略、甚至嘗試掩蓋或轉移的階級問題，也就是過去三十年全球財富及其資源分配的兩極化趨勢。當中推動的力量，則是所謂「新自由主義」³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政策。

這套美國學者大衛哈維(Harvey 2005)稱為「富人的復仇大計」--嘗試重奪戰後到七十年代在凱恩斯主義及社會民主主義主導下失去的經濟大餅份額--的「新自由主義」，在過去三十多年間急速擴大了全球性的貧富差距。到了今天，英美等地的貧富懸殊程度，

¹本文的部分段落，引用或改寫自筆者〈罷工、佔中與本土運動的政經根源〉，《明報》，2013年4月22日和〈如何理解香港的政治危機？〉，《明報》，2011年7月25日。

²儘管涵蓋甚廣，但近年影響最大的，恐怕是充滿排外(中國大陸)情緒的「本土主義」。因此本文著墨較多的，也主要是這種本土情緒政治。

³在「新自由主義」之前加上「所謂」，目的是說明這套興起於上世紀80年代，以小政府大市場、私有化(privatisation)、去規管化(deregulation)為名的意識形態，實際是選擇性地透過劇減利得稅支持大企業(如軍事工業)，同時又不斷打擊工會、壓抑福利的一套劫貧濟富政策，因此與一般人所理解以至重視的「自由」(包括思想、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自由)，其實拉不上任何關係，甚至可說是自由的反面。更詳細的討論，見許寶強(2012)。

已回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衰退前夕的危機水平。財富的高度集中，令佔人口少數的中上階層的購買力大升，政治權力不斷積累，連帶提高了其文化的影響力，愈來愈能夠因應他們的慾望、想法和行動，改造城鄉建設、社會政策、政治體制、經濟結構和日常生活；另一方面，戴卓爾夫人等「新自由主義」者所創造的語言概念，在富裕階級不斷增強的經濟和政治實力支撐下，透過大學、智庫、傳媒等機構散播滲透，逐漸成為了社會的共識，甚至迫使「左翼」社群(如英國工黨)也得使用(參閱 Zizek 2013)。

深受美國文化影響，並在戴卓爾夫人任內仍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自然難免承接「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而缺乏民主普選的香港，比英美等地顯然更容易滋長劫貧濟富的分配制度，因此成為全球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也有跡可循。換句話說，今天香港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以至由此催生的社會運動和文化批判，恐怕都有著這「富人的復仇大計」的根源，而以保育本土為目的社會運動，其實也簡接由全球急劇貧富分化(包括中國大陸)、金融地產不斷侵蝕本土資源、文化和歷史所催生。

在「新自由主義」肆虐的年代，量度貧富不均程度的本地堅尼系數由 1981 年的 0.451 上升至 2001 的 0.525 再上升至 2011 的 0.537⁴。財富集中在最近的十年間不僅沒有改善，更變本加厲。香港過去十年平均每年有 4.5% 的實質經濟增長，累積了近五成的增幅。然而，本地按固定價格計算的實質工資中位數，卻由 2001 年的 12,380 元下跌至 2011 年的 12,000 元，10 年的實質變化是負 2.9%(見統計處《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0572012XXXXB0100.pdf>)。當中 15 歲至 24 歲的青年，2011 年的每月收入中位數與 10 年前一樣，仍是 8,000 元(統計處《香港 2011 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青年》，<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0632013XXXXB0100.pdf>)，而同期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則上升了 12%。換句話說，不久前罷工的碼頭工人所展現過去 10 年面對的物質生活困境，顯然並非特例。

除了金錢收入外，更重要的階級兩極分化的指標，是其他資源的分配，以至社會地位、生活方式和精神狀態的變化。從 2007 年的紮鐵工潮到剛過去的碼頭工人罷工，除了爭取工資的合理提升外，還同時明確地向長工時說不，結合近年對最高工時立法的訴求，說明了勞動階層對時間分配的不滿；差不多同一時段，從天星/皇后抗爭到反高鐵保菜園到反地產霸權所指向的，是空間資源使用和分配的傾斜；而反對限制網絡資訊流通、要求增加大學學位和幼兒教育資源的聲音，同時導出了民間對知識資源分配不公的重視。換句話說，時間、空間和知識資源分配上的兩極分化，造成的社會問題及引起的反響，並不下於金錢收入分配不平等所導致的問題。此外，統治階級財大之後，氣自然變粗；相反，受宰制排拒的階級，失去的不僅是金錢的回報，更包括社會地位的下降、舊有生活方式的破壞、尊嚴自信的失落。

保衛本土生活和核心價值的各類運動，表面上針對的，是香港以外的「他者」，尤其表現為抗拒中國大陸的族群矛盾。不過，早期的保育本土運動(如天星皇后反高鐵)中所強調的「不遷不拆」，到最近反對在新界東北興建「雙非富豪城」和「港人港地」的提法，亦在在透露出階級矛盾的訊息：誰有能力以西九為基地建立中港兩小時生活圈？或購買本地的豪宅私樓？誰將喪失家園和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間？甚至抗拒中國大陸政權阻礙本地政治民主化的「佔領中環」運動，其實也反映了過去二、三十年階級

⁴中國大陸也有類似的趨勢，至今這個仍自詡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其貧富不均程度甚至超越歐美等「資本主義」地區，難道不是說明了，中國大陸自 1980 年代全面推展的「改革開放」，實質與英美同期鋪開的「新自由主義」，有點異曲同工嗎？

兩極分化的過程，已差不多擠壓掉了「溫和中產」所重視的價值及生活方式⁵。而「限奶令」、「自由行」所反映的中港矛盾，難道與國內新興中產階級未能在中國大陸獲得滿足其嚮往的中產理想生活，從而衍生出的生存策略無關？當然，這些佔中國大陸人口少數的中上階層，在大國效應下(1%的大陸人口就有一千三百多萬)，對人口只有七百萬的港人生活的影響自然巨大。

階級矛盾如何轉化為排外的本土主義

以當代美國為例，齊澤克(Zizek 2012)嘗試說明階級矛盾為何及如何轉化為排外的民粹政治。他指出，主要以性別和種族議題呈現的「文化戰爭」，其實是被轉置了的階級戰爭。美國的「統治階級」儘管不同意宗教右派的民粹道德訴求，但卻容忍他們發起的「道德戰爭」(例如反墮胎和同性戀)，主要是借此轉移階級矛盾，把下層階級(低收入農民和工人)的不滿，導向別的地方——針對(中產的)「自由主義者」(liberals)。而在美國鼓吹多元文化的「自由主義者」，儘管表示願意站在低收入階層一邊，但他們強調的婦女權利與種族平等價值，卻往往發放相反的階級訊息——批判被指責為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t)或父權的「低下階層」。吊詭的是，反種族主義和反性別主義追求的是差異的確認，希望不同的文化社群能夠互相尊重共處，而階級鬥爭所追求的，卻是否定其對立階級的位置，循這角度看，在當代美國，繼承(但轉移了鬥爭目標)傳統左派的階級鬥爭方式的，竟不是站於政治光譜靠左的「自由主義者」，而是極右的民粹主義。

在當代香港，財富和時間、空間、知識等資源兩極分化的影響，導致佔人口大多數的低收入和缺乏資源的社群，在面對中國大陸龐大的資金和政治力量南下時，往往首當其衝，日常生活直接受到干擾，因此較中上收入和擁有較多資源的社群，更容易滋生排外的情緒。基本上服務於佔產階級的官員和政黨，並不排拒甚至樂意把階級分化的真問題，轉化為對統治階級威脅不大的族群矛盾(例如梁政府樂於推動的「零雙非」、「港人港地」和「限奶令」)，而大眾媒體的操作又慣常把問題簡化誇大，再加上瀰漫於社會(尤其是網絡世界)的民粹政治，結果造就了近年以排外(中國大陸)為主調的「本土主義」的坐大。

然而，造成低下階層日常生活備受干擾排擠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來自資源的兩極分化，導致本土的土地、時間和知識等資源，愈來愈集中於服務中港兩地的高中收入階層。例如，商場街舖的改變、新建的私樓、公共交通如高鐵的設計、以至醫療和教育資源的分配，在在都受到掌控政治和經濟資產者所主導，使少數人口佔用了愈來愈多的土地、商品、知識，擠掉本地大多數人的生活空間和選擇⁶。然而，由於近年這種擠佔的過程，主要以「中港融合」的論述和中國大陸的自由行方式呈現，再加上「本土主義」論述和行動的推動，導致原本帶有強烈階級根源的擠佔本地低下階層生活空間的過程(如高價店舖取代街坊小販)，也逐漸被取代轉化成為中港族群之間的矛盾。

⁵曾俊華的「中產論」之所以惹來這麼大的反彈，恐怕與不少本地的「中產階級」再(或從來?)無法享受財爺眼中的理想「中產」生活有關。

⁶具體表現為：以連鎖店為主的商場取代了小販和屋村的街道店舖，商業中心的街道店舖則轉化成金舖、藥行、化妝品店、或電器零售，擠掉了過去主要為街坊和本地低收入百姓服務的食肆和商舖，同時擠掉了他們以往能夠享有的相對優質和有選擇的自由生活。

另一方面，自 1989 年後蘇聯東歐等共產國家解體，新自由主義當道，再加上近二、三十年強調性別、種族、年齡等身份政治的興起，文化多元主義對階級基要主義持續的批判，令強調資源分配正義的階級政治，逐漸讓位於側重追求被社會認可的差異政治 (Fraser 1999)，吊詭地與主流的冷戰反共(反文革) 論述合流⁷，客觀上進一步擠壓掉階級話語的空間，同時為「本土主義」的興起，清除了主要的障礙。

貧富懸殊、政治分化、流離失所與社會的自我保衛

隨著財富不斷往中港工商富豪手上集中，部分則流入主要為他們服務的專業中產階層，這些佔人口少數的中上階層的經濟政治力量也急劇膨脹。權力孕育更大權力，金錢衍生更多金錢，他們影響政府決策，佔用公共資源，改造社會制度，建立不平等的遊戲規則，使大學、傳媒、基建、土地等均向中港富裕階層傾斜。美國經濟學者 Paul Krugman 及 Robin Wells (2012) 分析，經濟的貧富分化會導致政治的兩極化，特別是既得利益的右翼份子將愈趨保守，嘗試阻礙任何不利他們特權的體制改革，甚至視溫和的凱恩斯主義為洪水猛獸，對奧巴馬的醫療改革(其實源自右翼的傳統基金會)也寸步不讓。在香港，經二、三十年的劫貧濟富，羽翼已豐的中港政商階層，也變得更加保守，在政治改革、財富分配等方面錙銖必較，或指鹿為馬以巧言偽術改換普選的定義，或只願意拿出短期的小「甜頭」(如外判商提出的「福利」，或港鐵巴士的「優惠」，以至財政預算的「派糖」)，不作長期承擔，更遑論改變分配結構。更甚的是，各種溫和的改革建議和行動，在這些慣享特權者眼中，紛紛化作「激進巨獸」--倡議最低工資「等同」走向「社會主義」或「福利國家」；和平的罷工集會竟被喻作「文革式手法」！

不平等的政經實力，進一步擴大不平等的分配和對邊緣社群身份地位的排拒。由少數中港中上階層掌控或主導的政治影響力及購買力，令不民主的功能團體選舉近 30 年不變，使住房商舖等「資產」價格高企，壓縮了本地工人百姓的生活空間，窄化了價值的準則，傷害勞動者的尊嚴，最終引來社會的自我保護--此起彼伏的社會運動，保衛本土生活和核心價值。文首所指的本地社會運動和文化研究在過去十年間的勃興，正是在這樣一種社會脈絡下發生的。

香港的情況並非特例，隨着 2008 年「金融海嘯」徹底暴露了富者(特別是金融機構) 享盡了政府干預的好處，但貧者卻被要求「唔該埋單」，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正逐漸轉化成全球性的政治危(轉?)機。由希臘、法國、泰國、馬來西亞等地民眾此起彼落的抗爭，到拉丁美洲左翼政治冒升，到中東的「茉莉花革命」，國際社會正出現了新一輪的反資本主義「階級鬥爭」，彰顯的也是社會中不同社群的自我保衛。

回到香港，社會的貧富階層走向兩極、政府政黨傳媒日趨民粹，逐漸動搖了「中產階級」企圖扮演社會中心的根基；政府、政黨的制度性暴力或街頭抗爭，也令不少處身「中產階級」位置的社群所崇尚的「理性溝通」、「程序公義」、「博愛和平」這些古典自由主義價值變得虛幻。「地產霸權」、「仇富」等(儘管不太精確的) 說法的湧現，反映了民衆針對官商階級的情緒。在這樣的社會轉型下，去年「七一」遊行隊伍

⁷ 「階級鬥爭」這詞，在過去或直至現在的香港，存在一種不証自明的共識，就是把它與非理性、極端激進、殘暴混亂等負面形容詞掛鉤，這也許與港人對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或想像有關。因此，在香港很難公開地以「階級」扣連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問題，除了去政治化的階級話語。於是，過去十多二十年，有關「階級」的主導論述，是「中產階級分析」。

中，又再出現了久違的「階級鬥爭」旗幟，揮舞者是一群年輕人⁸。

不過，「階級鬥爭」的提法，並沒有成為本地社會的論述的主要關鍵詞，甚至很快就被輿論遺忘。除了因為上述的階級矛盾被「本土主義」吸納轉化外，還可能由於這種缺乏中介的「階級鬥爭」提法，並未能擺脫以往帶經濟決定論的階級基要主義的陰影，也就是沒法把經濟不平等和剝削關係，與文化身份政治所強調的族群、性別、生態保育等同屬社會自我保護的關懷扣連。然而，儘管「階級鬥爭」不易言說，但面對佔產者對無產者共享的資源的掠奪不斷升級，擁有政治及文化宰制權者對邊緣社群的排拒及無視，階級視野顯然並非可有可無。因此，要理解香港社會近年的轉變，尤其是政治危機和相伴的社會矛盾的激化和社會自我保衛的興起，恐怕必須尋找合適的話語，直面日益明顯的階級對立⁹。

新時代的階級分析

一直以來，「階級」主要被理解為依據收入水平或不同職業劃分的社會位置，例如高收入的社群或金融地產等大企業 CEO 被界定為資產階級、中收入或專業白領行政是中產階級、低收入或「打工仔」則是無產階級。然而，這種根據社會位置劃分階級的做法，並不能有助我們理解不同社群的政治(或反政治)取態，例如，為甚麼中小企業組織會比大企業更反對「公平競爭法」？又或為何低收入的「打工仔」會投票予偏幫官商的「建制派」？因此，要理解香港社會轉型中的政治危機，需要重新思考「階級」的定義。

本文所提出的「階級」，其界定劃分的方式，並不僅包括狹義的經濟利益(如收入)或職業地位，而是同時包含不同的生活方式及價值信念。過去的階級分析側重於經濟剝削和物質利益，缺乏對生活品質和文化價值爭持的重視，這是十分狹隘甚至是錯誤的。正如波蘭尼指出，「一個階級的利益最直接地是指身份(standing)和等級(rank)、地位和安全，也就是說，它們首先是社會性的而不是經濟性的」(波蘭尼 2001：頁 131，下只標示頁數)，而「金錢利益也是與非金錢利益不可分割的」(132)，社會的災難也「首先是一種文化現象而不是經濟現象...導致退化和淪落的原因...是被犧牲者文化環境的解體...後果是其自尊和水準(standard)的丟失，不論其單位是一個民族還是一個階級」¹⁰(134)。波蘭尼所指的文化及社會生活的流離失所，包括「手藝被荒廢」、

⁸ 「階級鬥爭」旗幟於公共領域的再現，在相對保守和追求安定的香港，惹來了各方評擊自是意料中事。有趣的是，有關的批評大多只是引用文革的「集體記憶(或想像)」，扣連恐懼的政治，無需說理，只一再重覆「忘記了文革血的歷史嗎？」這嘲諷式老調，嘗試把「階級鬥爭」的提法消音。這除了無助我們理解「階級鬥爭」的口號為何會再次在本地公共論述中出場，也同時說明了禁制「階級鬥爭」話語，仍然在香港佔據着統治性的共識。

⁹ 僅使用波蘭尼所指的「社會自我保衛」，無法突顯當代危機的階級兩極分化根源，也相對容易被排外的「本土主義」收編。

¹⁰ 他以 19 世紀印度為例，指出問題不在於經濟剝削，而在於激進的自由經濟烏托邦破壞了當地舊有的共同體，但卻未能為平民百姓提供新的保護方式，結果導致大饑荒。類似的是，香港最近的碼頭工友的罷工，自然與工資待遇有關，但工友重視的還包括「爭番啖氣」。短短二十多天就籌集到數百萬的罷工基金，得到公眾的廣泛同情，顯然還基於工友所面對的不那麼人道的吃喝拉睡生活和工作方式，以至對平等、義氣和尊嚴等價值觀念的重視。而在佔中與本土運動當中，基於不同階級的不同生活方式及價值信念所產生的矛盾，例如特權 vs 普選、增長 vs 保育，更是昭然明瞭。換句話說，階級矛盾指的是：既得利益社群或財權佔有者對被排擠或不佔權產者的欺壓，包括經濟利益的剝削、政治權利的排拒、生活方式的改造，以至價值觀念的強加，最終令後者在物質和精神生活上流離失所，無法依自己的意願安居樂業。

「生存的社會和政治條件被破壞」(135)，因此才有社會自我保護的廣泛性，「最終，正是一個階級與社會整體的關係決定了它在歷史中扮演的角色；它的成功是由它能夠為之服務的利益的廣泛性和多樣性，而不是它自身的利益所決定的。實際上，只關注一個階級的狹隘利益的政策甚至不能護衛這種利益本身」(133)。循這思路，香港過去十年此起彼伏的社會運動和文化批判，也就是波蘭尼所指的社會自我保護，這並非建基於狹義的階級經濟利益，而是源自「新自由主義」對整體的社會生活和文化價值的破壞。

波蘭尼同時提醒我們，階級是變動不居的，這個觀點，在當代社會得到了迴響。J.K.Gibson-Graham 等學者(2000)提出，「階級」是一個佔用和分配資源的過程，而非根據先驗的社會位置來劃分。換句話說，決定一個人或社群屬於哪一個階級，主要取決於他或他們在其置身的資源分配過程中，是更多(或更少)地佔用了社會和自然資源，還是遭排拒或剝削。因此，同時擁有物業或其他資產(包括港人身份)以收取由此帶來的租值(rent)的「打工仔」，恐怕不一定會採用激進的「無產階級」政治取態。

齊澤克(Zizek 2010)進一步指出，當代政治的一個重要趨勢，是對文化資源、自然生態和生物基因的新「圈地運動」，也就是透過知識產權專利、私有化原本由公眾共享的土地、水、石油、森林等自然資源及動植物體內的生物基因，催生了新一輪的無產階級化過程--逐漸把大部分民眾原先擁有或共享的文化資源、自然生態和生物基因掠奪，使他們變成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因此，當代的階級應根據對文化資源、自然生態和生物基因的佔有或被排拒而劃分，歸類為「被選中者」(Included)和「被排拒者」(Excluded)兩種階級。齊澤克認為，新的「圈地運動」(或把文化資源、自然生態和生物基因等資源私有化的過程)，並非是根據你情我願的自由買賣邏輯操作，而是依賴法律或軍事等強制手段，製造壟斷性的地租，並借此而佔用各類自然與文化資源。例如，掌控私人電腦標準操作平台軟件的微軟公司，或獨享知識產權的專利持有者，又或港人熟悉的大地產發展商，主要並非依靠降低生產成本來增加利潤，而是透過建立或進駐壟斷的位置，收取廣義的租值，佔用自然和文化資源的最大份額。這也是「被選中者」(或「佔產階級」)對「被排拒者」(「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也是造成當代政治危機的根本原因。

因此，要扭轉社會兩極分化和由此引起的政治危機，「被排拒者」有必要針對擁有壟斷特權的「被選中者」進行抗爭。

共享的鬥爭：讓「本土」回歸「階級」

齊澤克認為，當代社會的「無產階級」主要包含三類社群--知識工作者、勞動工人和邊緣族群(例如失業者或新移民)，他們都同樣面對因「被選中者」(圈地者)的不斷佔用文化和自然資源而失去過去能共享的公共空間。困難的是，在窄隘的身份政治影響下，三類主要的「被排拒」者之間，往往未能團結對抗被選中的「佔產階級」，甚至相互排斥，例如知識工作者對勞工階層和邊緣族群的文化偏見，勞動工人也經常不滿知識分子和邊緣族群；而在這樣的不友善環境下，邊緣族群自然也不會對知識分子和勞動工人產生好感。因此，齊澤克相信，如果能夠讓全世界「被排拒者」(「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已經是走向一個更平等和公義社會的「階級鬥爭」過程中的重大勝利。

循齊澤克的思路，我們不難理解，為甚麼政治的鬥爭並不在於爭奪政府的權力(例如誰當特首)，而在於改造政權和政體的運作，使它有利於更平等和公正地分配自然和文化

資源。為此，我們需要改造那種建基於不同社會位置的身份政治(例如本土 vs 外族)，避免進一步分化「被排拒者」，而應在新的社會環境下，針對造成政治危機的源頭，創造新的或「活化」舊的政治(階級及本土)語言，提出有助理解和建設性地處理社會矛盾的論述，在「被選中者」(「佔產階級」)和「被排拒者」(「無產階級」)兩極分化愈來愈明顯的社會現實下，直面及認真分析已經不能再迴避或遮掩的「階級鬥爭」。

一個可資參考的分析進路，是馬國明對「本土」的定義。他認為，「本土」其實產生自升斗市民的日常生活，回歸「本土」就是「與被壓迫的祖先相認」。循這思路，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被壓迫的「祖先」，就是在不同時代受既得利益社群或財權佔有者欺壓或排拒的香港老百姓；「被壓迫」則包括了物質生活、社會地位和文化價值的流離失所；與他們「相認」，除了指情感的回歸，還包括站於雞蛋而非高牆一方的階級認同，以至直面階級矛盾而非轉移為族群對立、鼓吹排外政治的清醒「認」識。

此外，Fraser (1999)提出的不要把分配(redistribution)與確認(recognition)的政治鬥爭截然分割，也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的視野。她認為，所有的階級矛盾(分配政治)與身份差異(確認政治)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因此問題不是要二選其一，而是以平等的參與機會(parity of participation)，統合兩者。而在當代香港，本土及性別等身份政治如日方中，階級視野備受壓抑的社會脈絡，我們或有必要以非基要主義的方式和態度¹¹，相對地強調分配政治的重要性。

歐洲上世初的文明危機(大衰退和兩次大戰)，正如波蘭尼指出，根源自「放任主義」(舊版的「新自由主義」?)所鼓吹的激進意識形態和社會分配政策，對人類生活和自然生態產生了極大的破壞，導致各種形式的流離失所，催生了環保、工運、政改等社會自我保護運動。儘管這些社運看來分散，但其實來自同一源頭。他沒有討論的，是怎樣令這些不同運動更有效地針對這同一源頭，而非各自為戰，甚至相互抵消。這正是我們今天面對類似的困局時，需要認真考慮的。

¹¹ Grossberg(2010)指出，在當代社會到處浮現的基要主義，基本上是一種價值的負經濟(a negative economy of value)，也就是想全盤否定甚至滅絕他者之價值，而非像過去一樣僅建立一種劃分價值的等級。因此，當代政治的主要戰場，不在於在既有的價值坐標下追求再分配，而是爭奪界定甚麼是有價值的；而當代的危機，也主要體現於判斷和比較價值的危機(crises of commensuration)。面對這新的危機，他認為我們需要建立既能確認他者差異的價值、又不致普同化所有價值的比較價值的邏輯，一種非基要主義的邏輯。(Grossberg 2010: 160-168)

參考書目：

- Douzinas, Costas and Slavoj Zizek (2010): "Introduction: The Idea of Communism," in Costas Douzinas and Slavoj Zizek eds. *The Idea of Commu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Fraser, Nancy (1999): "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Identity Politics: Redistribution, Recogni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Larry Ray and Andrew Sayer eds. *Culture and Economy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London/Thousand Oaks/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pp.25-52.
- Gibson-Graham, J.K., Stephen A. Resnick and Richard D. Wolff (2000): "Introduction: Class in a Poststructuralist Frame," in J.K. Gibson-Graham, Stephen A. Resnick and Richard D. Wolff eds. *Class and Its Other*,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rossberg, Lawrence (2010): "Considering Value: Rescuing Economies from Economists," in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David (2005) :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rugman, Paul and Robin Wells (2012): "The Widening Gyre: Inequality, Polarization, and the Crisis," in Janet Byrne ed. *The Occupy Handbook*, NY: Back Bay Books, pp.7-17.
- Polanyi, Karl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MA : Beacon Press. (中譯：波蘭尼 2001，〈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馮鋼、劉陽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Zizek, Slavoj (2010): "How to Begin from the Beginning," in Costas Douzinas and Slavoj Zizek eds. *The Idea of Commu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Zizek, Slavoj (2012): *The Year of Dreaming Dangerousl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Zizek, Slavoj (2013): "The simple courage of decision: a leftist tribute to Thatcher," *NewStatesman*, 17-4-2013, <http://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politics/2013/04/simple-courage-decision-leftist-tribute-thatcher>.
- 許寶強(2012)：〈文化經濟學與情緒政治 - 否想香港的新自由資本主義〉，未刊稿。